

沉寂与变动

战争在前方打了三四个月，华容这个地方仍处在死水般的沉寂中。上海失守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，对于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过去的。

沉寂，当然绝非世外桃源。多数农民知道中国抗日了。但他们首先要顾及眼前，该怎样在重租、苛政、饮鸩止渴的高利贷等残酷压榨中挣扎生活下去。知识分子有关心时局的，有更关心身边近事的。就在6、7月间，县里很有势力的劣绅张作典担任县财政局长，在与对立的一派争夺权利的斗争中失败，贪污舞弊被揭发，案情继续发展。一些人拍手称快，一些人惴惴不安。最后查实，张担任财政局长两年又一个月，共侵占公帑及应该交出的各种款项，合计十三万五千余元，又谷若干石。有人算了一笔账，通常7、8月间新谷上市，一元六角一石。十三万五千余元是十万余石谷。全县人口三十万每三人就要缴纳一石谷归入他的私囊。这笔钱用于抗日军费，足供满员正规军一个师全月开支而有余。张因失去了后台，第二年被枪毙。省里宣布其罪状的文告上有“张作典派员征收摊款之时，屡有无故拘押人民暴行之举”；“华容劣绅狼狈为奸，

被害人民既不敢言，又不敢怒”；张“姿横暴戾，尤为贪污之魁。其恃势欺凌，蹂躏人民之处，凶恶万端，人民恨之人骨”等等。张的贪污横行，无疑是比较突出的。但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下，同类性质的事实司空见惯，不过具体情节有差异，绝大多数没有暴露公布于世罢了。报纸上说的全民抗战，在洞庭湖畔这块土地上不见声息。这种情况和普遍存在的统治腐败，劣绅恶霸当道，人民深受压抑，无人过问，联系在一起。

回家以后，我心绪烦闷，再也坐不下来专心致志读书。一个关系密切的私塾同学叫程稚香。地主家庭，居住县城西乡。上年我们一块赴长沙，我进国专，他人艺文中学。“七·七”以后他休学在家。我们这时又在一起盘桓，打发时光。

程稚香这个家庭对我当时求学和后来的生活很有影响。我上私塾的过程中，连续三年在他家“起爨”就读。老师是县里教过整整两代人的塾师、老秀才蔡瑞芝先生。学问根底扎实，文字雅驯，非训蒙塾师一类。早岁到省城长沙下过“秋闱”，颇知故老相传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大文人王闿运等湖南人物掌故。他提到曾国藩总要敬称“曾文正公”，不过说曾死时人们写的一副挽联：“杀贼功高，果为一朝真宰相；和洋罪大，早死三年是完人”，则是湖南士绅的“公论”。程稚香的父亲也是一位旧式知识分子，在家过田园生活。他钦佩蔡老前辈的学问，特持延聘在家培养自己的儿子。他觉得我是他儿子的“益友”，对我也

就表示关心。他家有不同注释本的杜诗，前人评论的所谓“陶甘杜苦”、“郊寒岛瘦”、“元轻白俗”、“韦淡”等，我头一次就是听他说的。他有位挚友朱婴是大革命时革命分子，后来长期潜居上海从事文化活动。朱婴新从上海书写寄来的多幅大字，他观赏时也叫我们看看，很快就又收藏起来。至于朱为何许人，他不肯多谈，只是说“他是做大事的”，“是想改造世界的”。他家常年订有省城报纸，好像是《湖南日报》。与读书有关的消息，例如章太炎在苏州讲学、叶德辉其人、长沙要印行《叶德辉全集》等，是他阅报时跟我们随便谈及的。我最初并不爱看报纸，时间长一点，渐渐对报纸产生了兴趣，并且从只着重看与读书有关的内容，变到先要翻翻时事新闻。后来回想过，如果没有在程家“起爨”的三年，我的思想肯定更加落后封闭，对外面的世界更加隔膜，肯定不会走出家乡，不会那样直接感受伟大时代风暴的强烈震荡，并投奔到民族解放战争炮火连天的最前线去。

日军占领平津，华北沦陷，给偏僻的华容地方多少也带来了一点影响。本地老一辈文人贺冕多年在北方活动，听说当过北洋政府时期的议员，以诗人著称。这时他回到了家乡，住在县城北面的老家万庾镇上。我觉得生活实在空虚无聊，便同程稚香一起去看望贺老先生，请他接受我们拜他为师，攻习诗文。他那时闲居，答应了我们的请求，就住在他家里。头一次见面，见他客厅里挂的书法中，有一幅署名“散原”，是一首五言律诗。我们不了解

散原是谁，后来问及，他才说到散原是当时被称为宋诗派代表人物的陈三立，即现在学界所推重的陈寅恪的父亲。那首诗是他们唱和中陈写给他的。人们称贺为诗人，大概与此有关。他每隔一两天，晚上来我们的房间里谈一次话，海阔天空。对于我们写的习作，他是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，发表意见，不下笔改文字。某次，我仿照杜甫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写了一组诗，背景是城乡出现各种名目的招兵单位，买卖壮丁，或者强拉行人。他看了以后嘱咐：“不要拿出去给人看，人家会以为我们不赞成抗战。”他儿子贺某打牌赌博，有时也走进我们的房间闲谈。有一次，老先生郑重地念着他儿子的名字说：“你们不要跟他通钱财，倘若他欠了你们的钱，我是不负责的。”这一些，可以看出他老于政治阅历，处事细密。我在贺家学习生活结束，快接近1937年末尾。家乡也就在沉寂中走过了抗日战争早期的日子。

战争发展的非常形势急剧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某些关系和状况。1938年初，那种改变的波浪终于冲击到了华容这个地方。以前听不到的议论、看不到的书，这时听到、看到了。一位素无交往的青年，借给我一本叫《唯物主义与伦理哲学》的书，令我吃惊。其中反复出现康德、黑格尔、卡尔、伊里契、某某夫人等人名，摘引他们的论点，指出他们是谁和为什么是唯心论、唯物论、二元论，加以评说。我既不知道那些人物，当然也无从索解书上的理论。硬着头皮往下看，仍然稀里糊涂。其实那不是一本禁

书，它流行很广。但对我来说，内容太新鲜了。我想从头求知，但并没有由此对孔学产生动摇。

与程稚香在春节以后见面，从他那里知道，多年隐姓埋名住在上海的朱婴同儿子、女儿回到家乡来了。知识分子有去朱家拜访，有打问朱活动消息的。朱仿佛成了“要人”。我意识到了这是抗日战争造成的人们的政治态度、思想动向的改变。朱在上海办一个名为《我们的学校》的小型刊物，他儿子叫朱允禧。因为程稚香的关系，我与朱允禧很快相识，看到了《我们的学校》。其中某期登有一则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消息，不过一二百字。我连续看了几遍，好像是一个人踟躅在暗洞中，忽然发现前面隐约有个亮点，有个出口。到延安去？这个念头在头脑里滋生、膨胀起来。

形势是这样：或者是在家乡恶劣的环境中苟安下去，那实在难以容忍，不情愿，而且苟安的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？或者改变生活，到通往抗战前线的地方去，这除了意味着舍弃家园，实际行动上又到哪里去接头，行得通吗？忧虑国家民族命运，寻求个人出路前途，两者结合在一起，拿定主意，到延安。确知长沙有八路军办事处，第一步先到那里去弄清情况。

1938年5、6月间的长沙充满抗日战争后方的浓烈气氛。头年冬天，日机多架轰炸长沙，欠下了中国人民一大笔血债。自那以后，空袭警报时鸣。虽不说是风声鹤唳，居民仍经常要把注意警报放在心上。旅馆跟从前不一样，

住着不少操江浙安徽一带口音的旅客，有的拖家带口。茶房称他们为“下江人”。他们是不愿意当亡国奴，历尽艰险，逃亡到后方来的。我看见一家人，孩子在父母身边天真烂漫唱儿歌，“锄头，锄头，要奋斗呀！”大人却紧皱双眉，为无家可归、生活窘迫发愁。旅客中军人也很显眼。他们都是从前线失散下来，找不到或者没有原部队可找了，准备另谋差事。一个身材细高的上校，携一年轻女子同住。三两天后，他妻子跟踪追来，原来上校从前线来到后方，没有回部队，先纳了一名幼妾。大批伤兵去年就开始运送到长沙，他们得不到必要安置，占领商店旅馆，并一度包围省政府。市民惊恐，与伤兵情绪对立。当局作了一些处置，秩序得到恢复。5、6月间，正当台儿庄战役以后，新的伤兵增加，问题又再次突起。我先在市区旅馆落脚，不久住到小吴门外郊区一家住学生的寓所。到市区去要经过伤兵集中的四十九标兵营外面。附近戒备森严，行人都加快步子走过去。伤兵仍有从围墙上翻出来，三三两两在街上游荡，滋生事端的。通衢路口，张贴某某集团军、某某路军学兵营、训练班等的招生布告，五颜六色。布告的发布者不知都是什么人，好像有顾祝同、汤恩伯那些名字。清华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临时校址、联络处等也见于街头路边的告白、通知单上。它们只受到少数人的注意，但也给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话题，谁人在哪里讲演，谁的行踪如何等等。马路上的书报地摊东一摊，西一片，兴旺热闹。报纸、刊物、时事小册五花八

门。《毛泽东自传》、《毛泽东论游击战》、《朱德访问记》、《彭德怀印象记》、《如此韩青天》等，都摆在那里。它们尤其吸引浏览者、购买者的注目。我翻开一本《文摘》，有一篇郭沫若写的与蒋介石的见面和谈话。题目和内容全忘记了，只记得其中一句话，蒋问郭：“你贵庚？”大概因为是《文摘》只载郭与蒋见面的内容，不及其他。那是郭最早给我留下印象的散文。在上海指挥“八·一三”抗战的张治中，这时任湖南省主席，他提出动员民众，改革行政。我住的郊区学生公寓老板是母女俩。女约二十来岁，每天早晨穿起规定的服装受军训两小时，回来满脸兴奋。市民看来表现出是愿意组织起来参加抗战的。

鲜血、腐败、愁苦、振奋、变革、希望、力量……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合制成一卷正在展开的空前大画图。它的鲜明的基本色调是抗战和信心。当时有人说湖南是“中国普鲁士”。我在全国抗日战争高潮中，短暂生活于“中国普鲁士”的首府，接触到的大致就是这一些。

这次我来长沙，是根据朱婴刊物提供的消息，寻找去延安门路的。我知道朱，他不知道我。50年代，从报纸上知道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，以及担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等。其间我两次去西安，没有时间联系谋面。1964年，我国举办北京科学讨论会，亚非拉美几个国家科学家出席，毛主席与其他领导人同各国学者见面。日本代表团五十余人，团长、副团长是坂田粒子学说创始人坂田昌

一、历史学家井上清。我是中国代表团团员。会后多数日本学者访问延安、西安，生物学家松浦一任团长。我陪同前往。到西安以后，越南、印尼、非洲国家学者也从其它参观地来此会合。省长举行招待会，我席终时致词。话不长，但每讲一句都要译成三四种语言。招待会后我问省外事干部，今天省里出席的都有谁？他一一说明，科委是副主任朱婴。呵！朱婴。我请外事干部与朱联系，明天上午我去拜望。这位干部坚持请朱来宾馆。第二天见面，我首先自我介绍。他说，难怪昨天晚上听你讲话总觉得是我们家乡口音。据他告知：贺冕在抗战中被推为华容参议会议长，后来是湖南文史馆馆员，他们间有书信、诗文来往。程稚香土改中自杀，朱允禧在北京外语学院任副院长。他本人1938年创办东山中学，青年人学踊跃。前一段能够正常上课，但也受到掣肘。武汉失守以后环境一天天恶化，学生纷纷被迫辍学。最后学校关门，他带领十几名青年打着“抗日宣传旅行团”旗子，徒步从家乡走向陕北，沿途遭遇不少困难，终被克服。他叙述的这段经过，从一个局部反映了抗日战争前期湖南乡村统治状况，和一些青年在抗战道路上的选择。朱在十年动乱中被折磨致死，那是后话。

我一到长沙，很快见到了几位国专同学和其它学校学生。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地址和它的领导人“徐先生”——徐特立。徐老是湖南教育界前辈，青年时写血书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。“四十始学横行字”，到法

国勤工俭学，然后加入共产党，跟红军长征。如今又为抗日从延安来到故乡，很受教育界一些人士和青年的尊敬。学校团体请他作报告或者青年们去请教，他都热情对待。这使我感到去延安很有希望。从我住的郊外学生公寓到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交通不便，又连续躲轰炸警报。在将近三个星期里去办事处两个半天，最终把上延安的手续落实了。即将离开长沙的前一两天，在午饭桌上有人谈起了对社会主义怎么看的问题。一个平常谈吐豪爽的青年，忽然讲：“说不定我们中间就有社会主义者！”我心里一动，“我们”中的社会主义者指谁？难道是说我吗？不对，我还不配。